

第二章 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淵源

「詩界革命」這項文學的宣示正式被提出於光緒 26 年（1900）1 月 11 日《清議報》第 35 冊的「詩文辭隨錄」欄，至於由夏曾佑、譚嗣同於光緒 22、23 年間以現代學術、文化等新名詞入詩的嘗試，試作不久，即宣告失敗。（詳見第一章緒論）但被梁啟超視為詩界革命典範地位的黃遵憲，其早在同治年間〈雜感〉5 首詩中即有「我手寫我口」之語，突破傳統詩用字遣詞上保守的寫作觀，光緒初年出使日本期間即有〈日本雜事詩〉200 首以竹枝詞的形式，專門介紹海外風物，擴大傳統詩的寫作領域，在梁啟超在光緒 26 年提出詩界革命之前，黃遵憲已經是詩界革命的先行者。而丘逢甲真正接觸詩界革命這一文學觀念，最早也要從光緒 24 年（1898）戊戌政變後，與詩界革命大將黃遵憲在嘉應州密切接觸後開始（詳見本章第三節的論述），所以丘逢甲有意識地投入詩界革命麾下進行創作，應該是內渡以後才發生的事。

但是，丘逢甲內渡後投入詩界革命的文學創作，並非偶然，其主觀、客觀方面的因素，早在丘逢甲內渡後與詩界革命正式接觸前，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奠下了基礎。本章主要在全面性探討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文學活動發生關係的主、客觀條件。進入此一工作步驟，首先檢索丘逢甲內渡前詩作 441 首，包括少年時代習作 68 首，台灣竹枝詞 40 首，參加詩社活動時的詩作 51 首，己丑年入都之作 15 首，《柏莊詩草》267 首，找出其中與詩界革命文學主張不謀而合之處；其次，針對丘逢甲一生不管是內渡前還是內渡後，始終具備「在籍京官」與鄉紳等雙重社會位階，所具備務實的處世態度，並在政治立場上對尊王、保皇、大一統…等觀念的認同，進而論證其內渡後文學取向傾向於詩界革命的合理性；最後，客觀因素

方面，由於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指標性人物黃遵憲相識於內渡之前（即光緒 15 年、1889），並與內渡後的丘逢甲有頻繁的唱和詩作，進而引導丘逢甲順利踏進詩界革命的文學團體，縮短丘逢甲開拓詩界革命文學版圖的時程。以上種種，皆屬於丘逢甲參加詩界革命的淵源。

第一節 丘逢甲內渡前詩作的取向

丘逢甲真正接觸詩界革命這一觀念，最早從光緒 24 年（1898）戊戌政變後，與詩界革命大將黃遵憲¹在嘉應州密切接觸後算起。儘管其有意識地走入詩界革命詩壇是內渡以後才發生的事，但要認真追溯起來，丘逢甲在光緒 21 年（1895）內渡前（即 32 歲以前）的部份詩作，便可以看出他的創作傾向中有意無意地與詩界革命理論有著不謀而合之處，關於此點，余美玲〈丘逢甲《柏莊詩草》中四首台灣風土詩探析〉已有初步提到。

一、《柏莊詩草》中 4 首台灣風土詩與詩界革命的關係

余美玲根據丘逢甲《柏莊詩草》中的〈老番行〉、〈大甲溪歌〉、〈濁水溪歌〉、〈熱風行〉4 首長篇古體詩的特點，即一方面完整地取材自台灣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觀，一方面又傳達民情指責時弊，還兼抒發詩人主觀情志，來分析丘逢甲 4 首台灣長篇風土詩的意義與價值，結論可歸納為三：

¹ 一般認為黃遵憲「詩界革命」的宣言是 1868 年〈雜感〉中「我手寫我口」一語為代表。

一、丘逢甲四首長篇風土詩是台灣風土詩中最優秀的作品，不同於律絕的常將詩歌語序簡化、省略甚至錯綜顛倒，以創造詩語陌生化的新鮮感，這些風土詩選擇以長篇古體詩作為表達，讓詩歌整體表現出樸實雄健的基本風格，更增加詩歌自由創作的空間；而敘述的主線採直線的方式進行，直抒胸臆，氣勢豪邁，更奠定他往後「雄直」詩風的基礎；詩歌語序的意義明確，意脈清晰，明顯呈現散文化的傾向，也為將來倡導詩界革命的「以文為詩」開啟端倪，進一步突破拘束，追求詩體的自由化，使詩語富於句式與聲韻的變化。但作者為了彌補詩歌本身因此所產生明白如話淺顯的缺點，他又努力在典故對仗上下功夫，典故的張力讓詩語的想像無限延伸，對仗的精緻則深化詩語的意義，使得整體詩歌不論在形式或者是意義上彼此都能相得益彰。

二、就創作內容而言，由於實際的生活經驗，造就他對現實環境深刻冷靜觀察；而政治黑暗、前途無望的激憤與自身高潔情操的自持，則塑造他對弊政的清醒認識與抨擊，著意將寫實、寓意融合起來，讓他的詩蘊含深沉透澈的歷史感與批判的精神。

三、就丘逢甲本人的文學創作歷程而言，這些風土詩是他後來倡導「詩界革命」的先聲。從內渡後隨著時局的變遷，他的創作視界更集中在對現實政治的抨擊，詩歌的批判性與現實感越加強烈，尤其在他一系列敘事古體長篇中表現尤為出色，…《柏莊詩草》的風土詩是丘逢甲後來「重開詩史作雄談」時的實踐的開端。²

上述引文中與詩界革命直接相關的，一是丘逢甲古體詩有散文化的傾向，與詩界革命主張「我手寫我口」契合，一是丘逢甲詩作內容蘊含深刻的歷史感與批判精神，與詩界革命有意繼承杜甫「詩史」傳統、「以詩為劍」諷諭時政的主張一致，

² 余美玲〈丘逢甲《柏莊詩草》中的四首台灣風土詩探析〉，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2.3，頁 107-108。

該篇論文算是爲此議題打下基礎，大方向都說對了，也爲本章研究丘逢甲與詩界革命的淵源，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切入點。

二、〈台灣竹枝詞〉40首與詩界革命的關係

余美玲〈丘逢甲《柏莊詩草》中四首台灣風土詩探析〉雖然有可取之處，但細部的分析，例如丘逢甲「詩史」與杜甫「詩史」寫作技巧上有何差異，丘逢甲「以文爲詩」與韓愈「以文爲詩」的意義有何不同…等問題，仍有待深入分析。其他的建議，誠如余文的講評人周益忠所言：

題目乃談論台灣風土詩，唯整篇但探討四篇作品而已，是否不相稱？且第一節所言未收錄〈竹枝詞四十首〉，與〈諸羅雜詠〉之理由過於牽強，以所引學者言「台灣竹枝詞常只作現實客觀的描寫，較少顯露作者個人的創作情志」，則與風土詩之寫作意義上是否有矛盾，皆有待探討。³

的確，丘逢甲《柏莊詩草》共有 267 首詩（就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丘逢甲集》所收錄者而言），雖然〈老番行〉、〈大甲溪歌〉、〈濁水溪歌〉、〈熱風行〉4 首在台灣風土詩方面表現最爲傑出，但同樣屬於風土詩且篇幅不算短，也約略寄託作者個人情懷的〈台灣竹枝詞〉40 首實在不能割愛。竹枝詞雖然以客觀紀錄鄉土風俗爲其文體特徵，但它畢竟是文人以藝術手法加工過的文學產物，本質上就是帶有主觀情志的東西，陳平原〈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說到：

文人學者對於「鄉土」的認同，從來不是被動接收，而是雙向互動。選擇

³ 同上註，頁 109-110。

什麼樣的史事與風物，取決於接受者的心理需求；而在詮釋這些史事與風物時，由於加進了許多此時此地的個人感觸，又反過來強化了解說者的文化立場。⁴

由此可知，竹枝詞並非單純地客觀紀錄而已，只是以此為包裝，其實隱含著作者的思想情感與主觀情志，所以這不能成為剔除討論行列的正當理由。

另外，竹枝詞雖然以七言四句的形式為基本單位，但清代台灣竹枝詞多採聯章組詩的中、大型規模為常態，動輒數十首，例如郁永河〈土番竹枝詞〉24首、薛約〈台灣竹枝詞〉20首、謝金鑾〈台灣竹枝詞〉31首、陳朝龍〈竹塹竹枝詞〉22首、黃逢昶〈台灣竹枝詞〉75首、施士洁〈台江新竹枝詞〉32首、徐莘田〈基隆竹枝詞〉32首、丘逢甲〈台灣竹枝詞〉40首（據說原本有100首）…等，都是以大篇幅的詩句，針對同一地域內的各種生活文化面向做鋪陳。整體的系統結構也許不如單一首長篇古體詩來的嚴謹連貫，但其內容題材的豐富程度，就所反映的主題而言，應具有一定程度的完整性，與長篇古體詩在反映風土上的實質意義是相同的。

再說，詩界革命大將黃遵憲其代表性詩作，不僅以長篇古體詩反映政局時事，例如〈潮州行〉、〈朝鮮歎〉、〈越南篇〉、〈馮將軍歌〉、〈降將軍歌〉…等，也常用近體聯章組詩的方式完整紀錄社會事件，例如〈感事〉七律8首、〈述聞〉七律8首、〈香港感懷〉五律10首、〈再述〉七律5首、〈日本雜事詩〉七絕200首…等，皆證明近體聯章組詩也是詩界革命社會寫實詩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中，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七絕200首更是以傳統竹枝詞七言4句的七絕近體形式，紀錄海外風物拓展寫作題材，而備受詩界革命理論推崇的代表作之一。可見，聯章近體詩的組詩寫作形式，如數十首以上的竹枝詞，確實是討論詩界革命寫作形

⁴ 陳平原〈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當年遊俠人》，台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11月，頁94。

式，不可迴避的一環。

另外，竹枝詞此文類，其詩作的本質便具有白話口語、通俗易懂的特點，當然符合詩界革命「我手寫我口」、「以文爲詩」的主張，同時，竹枝詞以風土民情爲題材，也符合詩界革命「以俗事俗語入詩」的要求。再說，同樣是數十首的〈台灣竹枝詞〉寫作，丘逢甲與清代台灣遊宦詩人薛約、謝金鑾、黃逢昶所作的〈台灣竹枝詞〉也呈現不同內容，丘逢甲〈台灣竹枝詞〉與之相較之下，其特點有：以在地視角寫作，不宜揚清朝國威，以平常心看待台灣多元文化，不會將台灣本土文化寫成異國情調的口吻，其文人氣息較爲淡薄，近似民歌口吻，這和詩界革命大將黃遵憲寫作〈山歌〉15首、〈都踊歌〉、〈新嫁娘詩〉51首、〈己亥雜詩〉部分幾首…等詩，以民俗爲寫作題材的創作精神是一致的。何況丘逢甲本身也是客家人，對客家民俗本該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視，這也是丘逢甲日後與黃遵憲建立友好關係的淵源之一。這些很能說明丘逢甲的竹枝詞，儘管是在清代台灣詩壇盛行採采民俗的風氣，這樣的大環境下，不能免俗地也創作竹枝詞，但他的竹枝詞仍多少具備個人特色，而這些個人特色在形式和內容上，剛好與詩界革命的部份主張不謀而合。其他如〈遊仙詞〉12首、〈蟲豸詩〉50首…等大型近體組詩，雖不是竹枝詞的文類，但整體而言也具有敘事結構完整，內容與寫法在傳統詩古題上別出新意的特徵，〈遊仙詞〉雖然以仙人和仙境爲題材，但內容卻充滿人間世的味道，〈蟲豸詩〉所詠的對象是動物，但卻都是經過作者精心挑選，與各種世態相對應的內容來發揮，這種舊題新作的寫法，與詩界革命「以新意境入舊風格」的主張也有相通之處。

三、丘逢甲內渡前與詩界革命相關的其他詩作

以下筆者擬將丘逢甲 32 歲內渡前的所有詩作，即青少年時期的各體詩作 174

首和《柏莊詩草》267首重新檢閱，針對丘逢甲內渡前詩作與詩界革命主張相近之處，在余美玲〈丘逢甲《柏莊詩草》中四首台灣風土詩探析〉的基礎上，補充說明一番。

（一）「新名詞」的使用

細部來看，首先，就使用「新名詞」（此指翻譯西方名詞而言）來看，丘逢甲在光緒9年（1883）20歲時所作〈台灣竹枝詞〉第18、20首云：

門闌慘綠屢樓新，道左耶穌最誘民。七十七堂宣跪拜，痴頑齊禮泰西人。

罌粟花開別樣鮮，阿芙蓉毒滿台天。可憐駟僮皆詩格，聳起一雙山字肩。

（頁13）

其中，「耶穌」、「泰西」、「阿芙蓉」在當時即為翻譯西方的新名詞，放在詩中，新名詞讀起來順暢自然，不會令人感到突兀。根據張永芳〈丘逢甲與詩界革命〉說：「丘逢甲雖不喜『新名詞』，但因時代變化了，新的語彙不斷輸入，詩作要想完全迴避『新名詞』已辦不到，丘逢甲的詩，也適應形勢發展，採用了不少外來翻譯詞語，但丘詩所用『新名詞』，多為不得不用的人名、地名或專門術語，很少有西洋典故。⁵」可見，丘逢甲詩中使用翻譯的「新名詞」基本上視實際創作需要而使用，並非刻意使用新名詞，內渡前與內渡後使用新名詞的情況大致沒有改變，數量和種類皆不是太多。使用新名詞，是詩界革命一大特色，詩界革命早期即提倡使用大量新名詞，發現行不通後，才修正成必須將新名詞融入舊風格之

⁵ 張永芳〈丘逢甲與詩界革命〉：《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0年第9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頁276。

中。而丘逢甲內渡前在台灣也不可避免地接受新名詞，但他畢竟以審慎而嚴謹的態度從事寫作，不會急於標新立異，他的詩中謹慎地使用新名詞，與日後詩界革命強調將新事物融入舊風格的主張一致。

（二）「新意境」的創造

其次，就創造「新意境」（即運用西方新事物和新觀念為詩料，所產生的詩歌新境界）融入「舊風格」而言，丘逢甲於光緒 15 年（1889）26 歲，赴京應試期間作〈塘沽坐火輪車抵津門〉2 首云：

丁沽潮淺擁平沙，斷續春冰阻客槎。電影雷聲三百里，角飛城畔試飛車。

輪舟通後海門開，萬壘防秋拱將臺。不動夷氛三十載，等閑笑看火車來。

（頁 31）

詩中將新事物「火車」為交通運輸帶來的便利性，與其在邊防上的特殊角色扮演，所帶給人們生活上的全新感受，兼顧傳統詩的韻致，成功創造出「新意境」。同樣的例子還有〈歸舟口號〉：「過盡吳山過越山，閩山指顧海雲間；雙輪一日三千里，不待風潮送客還。」（頁 33）詠新式輪船的便利縮短交通時程，創造一種新鮮的生活感。

（三）「雜歌謠」形式內容的嘗試之作

再者，就「雜歌謠」形式方面而言，丘逢甲〈讀宋史岳忠武傳作〉（頁 94）是一首雜言長篇樂府詩，句式 3 言至 11 言不等，利用富於音節變化且通俗易懂

的雜言體，強化民族英雄岳飛的愛國精神，砥礪自己的民族氣節；〈割花嘆〉（頁 140）於整齊的七言句式出現古樂府常見的「吁嗟乎」感歎詞，詩料取材自台灣花市的市儈們，粗暴的對待水仙花的真實情景，作者表面上在替水仙花訴怨，實則藉詩達到開通民智、步向文明的現實成效。再就「雜歌謠」內容方面而言，〈台北秋感〉（頁 134）提到「牛皮借地狡夷心」以荷蘭人誑騙台灣人進而取得土地和物資的民間說法，寄寓著日漸重要的台北城必須提防外患不當入侵，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成為全詩畫龍點睛最妙之處；〈臺山有虎謠〉（頁 139）根據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物產〉篇「（台灣）山無虎，故鹿最繁」豐富山林資源的紀錄，隨著資源遽減，開發過當，以「虎」的意象，諷諭不當的開發政策，意味深遠，發人省思。以上例證顯示出，詩人從事寫作時知道要自民間取財，寫出具有民間視角的詩作，這與日後詩界革命也重視民間通俗文藝的主張，精神和實質意義上皆有相通之處。

（四）《柏莊詩草》整體感的呈現

最後，就《柏莊詩草》整體題材內容的分類來看，《柏莊詩草》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題材：

- 1、對時局的憂心：例〈得友人述懷奉答四十韻〉、〈台北秋感〉、〈去思詞〉、〈縱酒〉、〈病起書懷〉…等詩。
- 2、對平民土著的關懷：例〈鄰居皆農家者流也春作方忙爲作農歌以勸之〉8首、〈老番行〉…等詩。
- 3、關於文學或文化活動的紀錄：例〈重過台南道署憶自丁亥入署讀書文酒之會極盛至園亭新築唱和之作哀然成冊覓舊夢而難忘思墜歡之莫續用前淨翠園即事詩韻賦寄維卿師方入覲將南還也〉12首、〈韡之見和前作疊韻奉酬〉、〈送

黃大令芝生還浙〉、〈署台南守包君哲臣容舊嘉令也有德嘉人其人士思以詩歌頌之屬爲先唱包君在嘉予適掌教羅山署南守予又崇文主講也爲采輿論屬詞焉以予嘉人彙以贈包君〉…等詩。

- 4、台灣奇山異水或特殊風候的描摹：例〈濁水溪歌〉、〈熱風行〉…等詩。就詩作風格而言，或雄渾豪放，或沉厚深切，或慷慨悲涼，或清峻峭拔，皆精采可讀。

從上述分類作品看來，丘逢甲內渡前的作品確實具有雄豪矯健的特色。⁶正如余美玲所說：

《柏莊詩草》中我們清楚感受到詩人創作的視野從個人身世的感嘆轉向動盪現實的關注，敏銳的觀察到時代的變化與社會脈動，將他自我的熱情、感嘆、悲憤都化入客體的對象中，使全詩充滿憂患感。從他平日的生活感懷，到一系列的〈遊仙詩〉12首、〈蟲豸詩〉50首等無不出以感憤悲涼的情緒和心境作為基本的情感內涵，來呈現他的時代與憂患，這些內容更具體的反應在他處理台灣的風土詩上，進一步使詩歌的主題更趨深化，蘊含豐富深沉的歷史內容。⁷

因此，《柏莊詩草》的寫作基調大體是以雄直的詩風反映丘逢甲對時局的憂患，並寄託他對台灣鄉土的熱愛，這與詩界革命追求「以時事入詩」、「詩外有事」、「詩中有人」的理念可謂不謀而合。

由以上所述可知，在丘逢甲尙未有意識地創作詩界革命新派詩之前，其部分

⁶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6，頁 63-70。

⁷ 余美玲〈丘逢甲《柏莊詩草》中四首台灣風土詩探析〉，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2.3，頁 92。

詩作本身即明顯具有「我手寫我口」、「詩史」、使用新事物和新名詞創造「新意境」，並保持傳統詩原有的韻致、「雜歌謠」形式的自由與內容的通俗…等特點，整體來看也具備取材自生活體驗並「以時事入詩」的傾向，這些特點在他尚未接觸詩界革命觀念以前即有所實踐，這些具備詩界革命特徵的內渡前詩作，可說是丘逢甲為日後正式投入詩界革命行列之前，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丘逢甲的社會位階與處世之道

對照丘逢甲內渡前、內渡後的詩作，來歸納他與詩界革命的淵源，顯然無法百分之百說服人，尤其丘逢甲所面臨的晚清社會，是一個前所未有、各方面都產生劇烈變動的社會，加上他在特定時刻又曾站在歷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丘逢甲不管是客觀環境的遭遇或是主觀情境的感受，對一名傳統知識分子而言，都已經超出其所能承載負荷的範圍，此時期「恭逢其盛」的文人都在各自找尋得以適應變化，立自身於不敗之地的法門。

丘逢甲在內渡前的部分詩作，儘管可以找到與詩界革命理念相似的作法，但晚清的詩壇眾聲喧嘩，百花齊放，除了詩界革命的新派詩外，還有宗宋的同光體詩派、宗漢魏的王闓運湘鄉詩派、宗中晚唐的張之洞詩派，每個詩派都有其基本盤，未必能保證丘逢甲內渡後一定選擇詩界革命的領域。然而，造成他日後走上詩界革命之路，除了上節所討論的線索外，還要再參照丘逢甲「在籍京官」與本土鄉紳的雙重身份，其處世之道與社會位階的價值取向，才能論證成立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所結下的不解之緣。

一、絕意仕進的現實考量

丘逢甲做爲一名傳統知識份子，便免不了具有此身分階級的屬性，具體表現在他年輕時對科舉功名的積極經營上。光緒 3 年（1877）14 歲的丘逢甲即虛報年齡爲 16 歲，至台南府城應童子試，作〈窮經致用〉（調寄西江月）詞一闋云：

興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才雄。更兼經史滿懷中，祇覺大才適用。 欲
布知時甘雨，願乘破浪長風。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頌。（頁 5）

這闋詞中「祇覺大才適用」、「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頌」，表明了丘逢甲對仕宦一事充滿美好的想像，並且蓄勢待發，準備大展長才的雄心壯志，果然該科獲院試第一，前途一片看好。到了光緒 11 年（1885）22 歲的丘逢甲赴福州鄉試，一向自信的他竟然落榜，打擊應該非同小可，於是尋求民間「冥婚」習俗來替自己的考運不濟做解套，即使當時他早已娶廖氏爲正室。據丘氏宗親丘秀芷說：

冥婚問題此事係記載於族譜中，1877 年時曾祖父（丘逢甲父丘龍章）在大坑開墾，霧峰林家來說親，以（丘逢甲）年幼未得功名，辭，霧峰林卓英（林獻堂的堂姊）不久後過世，1885 年與霧峰林文欽（林獻堂的父親）同赴福州參加鄉試，二人均未考取，林文欽欲逢甲公娶林卓英靈位，在回台途中遇大風浪，從船上似乎看見女子形像，怪逢甲公未考取係因未娶其靈牌位，於是次年（1886）往霧峰迎林氏靈位。⁸

⁸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研教中心主辦《丘逢甲與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補編》，台中，逢甲大學，1997.2（會議時間 1996.3.16-17），頁 90。時至 1902 年，丘逢甲爲霧峰林獻堂的祖母羅太夫人寫祝壽文時，仍自署名「侄孫婿」，見丘逢甲〈恭祝誥封恭人林大母羅太恭人八旬開一壽序〉，《丘逢甲集》，頁 833。

以「冥婚」方式來改善自己的運勢，足見丘逢甲追求科舉功名之積極，也可見丘逢甲與霧峰望族林家私交之密切。此後，歷經光緒 14 年（1888）的重考中舉、光緒 15 年（1889）北京會試、殿試連捷，終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階正六品，至此科舉功名的追求總算開花結果，下一步應該是學以致用、報國治民的當官計畫。但丘逢甲卻在到任不久後，以親老之故援例告歸還鄉，從此號稱自己絕意仕進。目前學者們對此事的看法，根據〈得友人書述懷奉答〉40 韻、〈去思詞〉4 首、〈乞歸已逾三載感賦〉2 首、〈黃金台〉、〈閒居雜興〉2 首…等詩作的內容，多傾向於是光緒 15 年北京赴考之行，讓丘逢甲真正見識到晚清政治的腐敗，令他英雄無用武之地，才對仕宦之途失望。

然而，是否還有其他可能的因素呢？楊護源《丘逢甲傳》分析丘逢甲被授與之官「工部虞衡司主事」的現實難處，說到：

丘逢甲被授與之官為正六品，屬於京官的中下階層，生活是較不優渥的「窮京官」。因京官無法像外官（地方官）一般取利於民，而中下階層之京官俸祿較低，但為維持官儀而支出頗多，故生活十分的清苦。…丘逢甲所授之官職，按清例，並非實職。僅為候補官銜，如能在三年內補得實缺，已是上上大吉。故初分至部時，丘逢甲可以「援例」告假回籍省親、掃墓；若有補缺之信，丘逢甲即可銷假赴京辦理各種到差手續，但丘逢甲在告假回鄉之後，便未再赴京到差，其原因可能與上述京官「窮」的經濟因素有關。因其若以「京官」之身分返鄉，在鄉則為鄉紳，生活自可無虞。⁹

可見，丘逢甲被授與的官職確實不盡如人意，一名傳統知識分子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獲得科舉功名，但若未能兼顧到現實生活，那科舉功名也只能是一種精

⁹ 楊護源《丘逢甲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24。

神滿足，無法具有實質意義，因此，高中進士後的丘逢甲確實有必要以務實的精神重新規劃未來，或重新出發。

清代台灣與丘逢甲類似，不熱衷仕宦、選擇留在台灣服務的情形本土進士，案例也不在少數。檢閱清代台灣本土進士的仕宦紀錄發現¹⁰，多位台灣本土進士並不那麼熱衷於仕途，例如：

- 1、乾隆 22 年（1757）諸羅進士王克捷沒有正式當官的紀錄。
- 2、道光 3 年（1823）新竹（時隸淡水廳）進士鄭用錫只有在道光 14-17 年間任職北京，而且還是以捐官的方式補上「禮部員外郎」一職，其餘時間皆在台奉親。
- 3、道光 25 年（1845）台灣縣進士施瓊芳於次年便返台任海東書院山長職務。
- 4、同治 7 年（1868）宜蘭進士楊士芳於次年便返台任仰山書院祭酒職務。
- 5、同治 13 年（1876）鹿港進士蔡德芳於光緒 5 年（1879）返台主講於文開書院與白沙書院。
- 6、光緒 3 年（1877）台南進士施士洁即使官授「內閣中書」，仍辭官返台任教於白沙、崇文、海東書院。
- 7、光緒 6 年（1880）鹿港進士丁壽泉返台職掌白沙書院。
- 8、光緒 12 年（1886）嘉義進士林啓東返台職掌崇文、羅山書院。
- 9、光緒 12 年（1886）嘉義進士徐德欽返台職掌玉峰書院、嘉南清賦總局、團訪局教練。
- 10、光緒 12 年（1886）鹿港進士蔡壽星於光緒 18 年（1892）返台職掌白沙書院。
- 11、光緒 15 年（1889）豐原（時隸彰化）進士丘逢甲於次年返台主講於衡文、

¹⁰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2003.12，初版。

羅山書院。

- 12、光緒 16 年（1890）台南進士許南英返台加入「台灣通志總局」修志籌備工作。
- 13、光緒 18 年（1892）桃園（時隸淡水廳）進士陳登元返台後入劉銘傳的幕僚，任新式教育西學堂的監督。

以上案例雖然無法證明每位返台進士是否都著眼於現實利益的考量，但至少可見丘逢甲高中進士卻不熱衷仕途，放在清代台灣本土進士圈的仕宦情形來看，他絕非特立獨行，倒是屬於是滿普遍發生的情況，其中的原因可能為何？林熊祥〈邱逢甲在台灣文學史之位置〉說：

背鄉井、渡重洋而來台灣者，類皆富於冒險精神，熱意開闢草萊，阜物厚生。意志堅強，情緒質樸。又值台灣氣候溫暖，土地豐沃，墾殖易成，產物勃然以興。有為之士趨實業者多，求功名者少。間或得一第，但假之以自儕於縉紳之列，不復有干祿上進之心。歷年成進士者，還鄉不出，流宦四方者殆鮮，此所以難接近中原文物也。¹¹

同樣地，楊護源《丘逢甲傳》也說：

丘逢甲所授之官雖只為六品小京官，但其若能設法外轉為地方官，則其聲望與前途均非一般外官所能比擬。但清廷任官有所謂的迴避制度，…故丘逢甲若外放至地方也永遠回不了故鄉台灣任官。…若任官外地，返鄉、履職必多次往返這條「黑水溝」，危險性大增。台灣重利風氣比內陸為盛，行行出狀元，使士人有較多的選擇，不執著於為官一途。…丘逢甲不仕歸

¹¹ 林熊祥〈邱逢甲在台灣文學史之位置〉，《台灣文獻》9卷1期，1958.3.27，頁1146。

台，應受海峽風浪險阻和台地重利之風所影響。¹²

以上資料說明，從台灣交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來看清代台灣本土進士回台任教的原因有：(一) 黑水溝的險惡造成台灣人往中國大陸發展的心理障礙。(二) 從清代台灣移民社會與經濟型態發展的特殊性來看，「台灣錢，淹腳目」使台灣人更想要留在台灣發展。此外可能也包含語言溝通不良，人脈經營不順利等因素。因此，丘逢甲的絕意仕進應該也有很現實、務實的考量在其中，絕非只是單純地對政治失望的因素而已。

二、務實的處世態度

高中進士後的丘逢甲雖稱「絕意仕進」，但實際上他是以「請假告歸」的理由返台，援照往例，原職銜仍舊保留，並非「棄官歸里」，此「在籍京官」的官方身分始終伴隨丘逢甲，但實務操作上，他的行為處事始終是鄉紳階級的風格，成為其安身立命的寄託，具體表現如下：

(一) 甲午戰爭之前的角色扮演

光緒 15 年（1889）26 歲返台後的丘逢甲，往台南謁見唐景崧，婉拒唐勸其出仕之邀，執意回彰化省親。光緒 16 年（1890）丘逢甲 27 歲應唐景崧之聘，擔任台南崇文書院、台中衡文書院、嘉義羅山書院主講，「在教學中，丘逢甲根據自己的體驗和對世事的觀察分析，大膽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他不再重視八股括帖之類的東西，只是略課應試文藝，把主要精力用於介紹中外史地和當今時

¹² 楊護源《丘逢甲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24-25。

事，傳播西方新知識新思潮，勸閱報章，引導青年放眼五洲，關心國事和民族前途，他自訂了一批書刊，如香港《德臣報》（中文版）、上海《申報》、《字林西報》和《天津時報》等，並撰文評介國內外大事，警醒國人關注時局，鼓吹革新除弊，謀求富國強兵之路。¹³」另外，他還提倡招收高山族青年入學，對當時台灣的全民化教育意義深遠，詩界革命主將黃遵憲於英國倫敦聞訊，作〈歲暮懷人詩〉讚之，詩云：

赤嵌城高海色黃，乍銷兵氣變文光。他年番社編《文苑》，初祖開山天破荒。（自注：丘仙根工部）¹⁴

黃遵憲作此詩的前一年，在北京結識新科進士丘逢甲，兩人有著一見如故的情誼。黃詩認為丘逢甲是繼沈光文「海東文獻初祖」之後，對台灣原住民教育貢獻極大的人士。接著，光緒 18 年（1892）《台灣通志》總局開設，編纂工作正式展開，丘逢甲應聘擔任「採訪師」，主要負責採訪補輯鄉土故實，有了更多機會深入民間，了解社會虛實。於是〈老番行〉、〈大甲溪歌〉、〈濁水溪歌〉、〈熱風行〉等長篇風土詩才能寫來身歷其境，栩栩如生，〈乞歸已逾三載感賦〉2 首、〈得友人書述懷奉答〉40 韻、〈去思詞〉4 首、〈友人以租字韻詩所和因書所見〉2 首（頁 88）…等詩，表達在台灣本土深耕而茁壯的願望，也不失為自我實現之途，才能對於官聲虛名有不同的思維。

丘逢甲從擔任書院主講到方志採訪師，他都有欲望想要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負，同時「在籍京官」的身分讓他與官方產生聯繫，於是他得以與官方、民間保持著合作關係，他常常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遊走於官方正規體制的邊緣，在地方民間推行改良主義，這便是拜「在籍京官」與鄉紳雙重身分之賜，因為這樣的

¹³ 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9，頁 42。

¹⁴ 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3.4，頁 550。

身分與職業，對兼顧自己的理想和家族的期待最為有利。

（二）甲午戰爭至內渡前的抉擇

清日甲午戰爭開打至內渡前，丘逢甲擔任的職務向來有諸多說法，例如團練使、內務卿、大將軍、副總統、副總統兼大將軍、義軍統領等 6 種。據戚其章〈丘逢甲在台灣任職考辨〉肯定丘逢甲在台擔任的官職確實為「台灣省義軍統領」，而且「從統領體制看，丘逢甲不僅高於一般義軍統領，而且與清兵諸將相比，也有相當的獨立性。…這與吳湯興凡事須稟請台灣知府是大為不同的。在營制上，丘逢甲義軍雖與記名提督張兆連的銘軍和福建候補道楊汝翼的翼軍相同，皆獨當方面，然卻不似張兆連、楊汝翼等清軍將領一聽命於巡撫。在軍事部署和義軍組織方面，唐景崧凡事皆須與丘逢甲相商而後定。在丘逢甲不同意的情況下，唐景崧的決定可不執行。¹⁵」而黃秀政、楊護源更在〈丘逢甲與一八九五年反割台運動〉一文中將丘逢甲擔任義軍統領的來龍去脈，以及他與唐景崧之間的關係生變，都交代的清清楚楚¹⁶。然而，嚴格說起來，團練或義軍都不是朝廷軍隊的常態編制，其統領也多為精神領袖的性質，洪棄生《寄鶴齋詩話》更指出「林朝棟棄臺西遯，較邱進士尤難掩眾論。蓋仙根書生，未爛戎務；出領義軍，係唐景崧濫舉。¹⁷」由此可知，丘逢甲並沒有跨入正式的官宦體制中。

撇開個人恩恩怨怨不說，丘逢甲「在籍京官」與鄉紳的雙重身分，確實在台灣危急存亡之關鍵時刻發揮一些助益，「在籍京官為具有官宦前途與崇高社會地

¹⁵ 戚其章〈丘逢甲在台灣任職考辨〉，吳宏聰、李鴻生主編《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兩岸三地學者論文專集》台北，世界丘氏文獻社，1998，頁163。

¹⁶ 黃秀政、楊護源〈丘逢甲與一八九五年反割台運動〉，黃秀政等《臺灣史志論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3，初版二刷，頁153-164。

¹⁷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304種《寄鶴齋選集》，1972，頁208。

位的鄉紳，在清朝統治下的社會，丘逢甲具有社會自然領袖的性格，其對民眾居於領導，對官府則享受特權。¹⁸」所以丘逢甲在無法置身事外的關鍵時刻，仍小心地、巧妙地運用「在籍京官」與鄉紳身分的優勢，一方面藉著自己紮根民間的聲望，凝聚台灣人民抗日共識，積極進行團練事宜，儘管自己對軍事實戰並不內行；一方面對以唐景崧為首的滿清官僚體系，發揮最大的制衡作用，使官兵必須與台灣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上，共同抗日。

即使是台灣民主國成立，丘逢甲仍不輕易走向幕前，但願意全心全力在幕後奔走打拼，連橫《台灣通史》卷6〈職官志〉之「民主國職官表」只紀錄大總統、軍務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游說使、府州廳縣等舊式的編制¹⁹，未見「義軍統領」在此編制名單上，「義軍統領」顯然不是台灣民主國所新授官職之一，丘逢甲雖是台灣民主國的靈魂人物，但他是以鄉紳的身分去影響大局。可惜，由於時間倉卒，諸多配套措施未就緒，台灣民主國抗日事業宣告失敗，最終他雖選擇內渡，沒有留在台灣繼續抗日，但不可否認地，丘逢甲以鄉紳身分為台灣抗日史做出了他個人最大的努力。從〈談兵〉（頁88）、〈讀史〉（頁92）、〈走筆〉（頁98）、〈與呂大謝四夜話近事〉（頁118）、〈台人輿頌篇上維卿師六十韻〉（頁131-132）、〈台北秋感〉（頁133-134）…等詩中，皆表現出內渡前丘逢甲對台灣時局的憂心，並不排除做出最壞的打算。

根據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指出，乙未內渡的鄉紳佔全部鄉紳的比例高達二分之一²⁰，丘逢甲選擇內渡是務實的，至少可保全自己和家族的身家安全，而內渡後清廷對台灣科舉士人也將會有安置，在現實的考量

¹⁸ 黃秀政、楊護源〈丘逢甲與一八九五年反割台運動〉，黃秀政等《臺灣史志論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3，初版二刷，頁163。

¹⁹ 連橫《台灣通史》上冊卷6職官志，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1，頁146-147。

²⁰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第二章〈日據初期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與變動〉，台北，正中書局，1992.7，初版二刷，頁27。

上，內渡也絕非特立獨行或者天理不容，只是在情感上、道義上、理想上，內渡卻成了丘逢甲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造就了《嶺雲海日樓詩鈔》中不斷反覆迴旋的台灣意象與主題，這也是鄉紳階級意識以務實考量為抉擇之下，必定擱置理想、道義等考量，所產生的普遍而必然的狀況。

（三）內渡後的安頓

內渡後頭幾年，丘逢甲面臨了人生的最低潮，他像難民一樣突然來到從沒經營過的廣東祖籍老家，廣東又有部分土紳聯名指控他造反，以至於他的詩文常自稱「海東遺民」（〈離台詩〉頁 145），自認「去國懷鄉」（〈舟入梅州境〉頁 147），然後還要承受著來自於台灣民間多方面對他棄台內渡的指責的心理壓力，部分好友與親人內渡後又選擇回台，令他進退兩難，英雄失路，這些種種的挫敗，可參見魏仲佑〈丘逢甲及台灣割讓的悲歌〉關於虬髯事不成、揮淚說台灣、成敗論英雄、詩史作雄談等方面的精闢分析²¹。另外，〈阮生行〉（頁 157）、〈放生鵝歌〉（頁 177）、〈廬山謠〉（頁 193）…等詩，雖不直接描寫丘逢甲面臨英雄失路的悲哀，但透過隱喻和形象化的藝術處理，也可強烈感受到他初到廣東被眾人圍剿，沒有歸屬感的淒涼景況，其慘狀不輸給台灣被割讓所造成的傷痛。

內渡後的心境雖然淒涼，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最現實的問題是自己原本在台灣的一切條件是否可以繼續享有？丘逢甲於是寫奏摺向清廷呈請變更籍貫，交由兩廣總督譚鐘麟、廣東巡撫許振煒代奏。籍貫是官員履歷不可或缺的項目，籍貫有所變動者，必須主動向相關單位呈報，以繼續保持其科舉出身、詮選資格。而且內渡後丘逢甲遭受鎮平劣紳聯名指指控造反，他更有需要藉助朝廷的公信力為自己平反，汪叔子〈關於丘逢甲內渡歸籍的一件檔案史料〉說：

²¹ 魏仲佑〈丘逢甲及台灣割讓的悲歌〉，《晚清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12，頁 103-130。

倘欲仍留此「工部主事」職銜，則官場虛文，不得不有此「呈請奏咨」之舉，及申明「俾得赴（工）部供職」之言。…對於內渡之初，備受地方劣紳攻訐之丘逢甲，尤其關係重大。倘不予解決，即將貽人以「身家不清」之口實。宵小環伺，乘機傾軋，則退且難以安身立足於廣東原籍，遑論進而充分利用社會地位繼續開展愛國事業。²²

在務實的考量下，丘逢甲努力爭取恢復自己的官方身分，雖然實際上他仍是絕意仕進，所以於光緒 22 年（1896）年底奉旨「歸籍海陽」（潮州），恢復「在籍京官」的身分，同時也為自己取得躋身於廣東鄉紳行列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此後，丘逢甲秉持內渡前在台灣經營聲望的模式，繼續在廣東經營下去。隔年（光緒 23 年）應潮州知府李士彬之聘，主講韓山書院，再隔年（光緒 24 年）主講潮陽東山書院，光緒 25 年（1899）又主講澄海景韓書院，走向官辦學教職的舊業。光緒 27 年（1900）更自力籌措經費開辦「嶺東同文學堂」，自任監督，達三年之久，雖是民間自辦的新式學堂，但仍任教職，皆不屬於朝廷編制內的正式職務，即使是後來擔任新式官職政要，像是廣東諮議局副議長，他也沒有放掉對教育事業的關注，理想與抱負仍得以發展。

丘逢甲務實地維護自己的官方身分與鄉紳身分，到了 1905 年科舉制度廢除時，驗證了他的考量是明智的，同時讓他游刃有餘的在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兩大勢力中吃的開，兩派人馬都不得罪，成為自主性極高的知識份子。陳平原〈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說：

綜觀丘氏一生，有過若干「虛職」，卻沒有得到過稍微像樣一點的「實缺」。不是沒有可能當官，而是不願意，這在同時代的讀書人中，確實少見。此

²² 汪叔子〈關於丘逢甲內渡歸籍的一件檔案史料〉，《嶺南文史》1998 年第 1 期，頁 27。

種溫厚且淡泊的性情，決定了丘逢甲本質上是個「書生」。書生報國，並非特有政治抱負及軍事謀略，只是不忍見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²³

光緒 29 年（1904）丘逢甲〈溫柳介先生誄〉說到：

夫中國自秦以後，益集權中央政府主國是、持風會，惟一二親貴強有力者任之，無論起布衣、徒步之不得遽與也，即循資干進積年勞至卿貳，天下望之巍然，而察其身之與國，多若渺不相涉。則固不如耆儒碩學之不仕不顯，而歸而講學于郡邑者，猶得以其學說陶鑄當世人才，其所鼓舞而激勸者，于人心風俗往往大受影響也。（頁 838）

這段文字雖然是丘逢甲寫溫仲和的，但其實是他藉機會說出自己安身立命的寄託。丘逢甲從務實的角度來考量理想抱負的實現，發現辦教育比搞政治來的有意義多了，而且他自己又保有「在籍京官」的身分，既可以在民間穩固自己的聲望，成為地方上精神領袖人物，同時也可兼顧鄉紳基本門面的生活開銷，至少不愁吃穿，應該也很適合內渡後丘逢甲的需求。

三、政治立場

丘逢甲對自己階級身分的體認，雖然有著現實與理想雙重的考量，但仍然可以從中看出其思想根本的侷限。由於中國知識份子不管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長久以來並沒有像西方一樣，以純粹的專業知識做為其生存方式，成長為一個獨立

²³ 陳平原〈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當年遊俠人》，台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11 月，頁 97。

的社會階層，因而注定在中國社會的轉型與過渡時期，將會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存在。冀建中〈毛將焉附？——論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說：

（晚清）知識分子還在傳統之中。在以後的五四運動中，無論啟蒙也好，救亡也好，知識分子實際上依然是用傳統的救世方式在拯救國家。他們只想創造一種新文化，而沒有努力去改變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沒有去努力為本階級奠定一種堅實的、真正有利於社會發展的生存方式，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與社會的侷限。…沒有新階級成長的空隙，知識分子只有兩種選擇，或依附於統治者，或依附於被統治者。並且，在戰爭而不是和平發展的歲月，「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都是遠水解不了近渴，被實踐證明了不可能。²⁴

這樣的侷限性是中國歷史的必然，丘逢甲不管階級身分如何，抉擇如何，其無奈程度都會差不多。

另外，有待釐清的問題尚有：內渡後丘逢甲的政治立場，該如何解釋？一般都是說他起先是立憲派，後來因為對立憲派失望，發現受騙，轉而同情支持革命派，並說他對民族主義大力提倡，主張恢復漢室，順應時勢所趨，是一位愛國志士²⁵，感覺上解釋的很籠統。其實按照丘逢甲的鄉紳身分，其所具有的階級意識來推論，其內渡後的政治立場應該是屬於擁護帝制這一派，不太可能會支持破壞帝制的一派（詳見下文）。然而又因為他表現在對新式教育的高度關注下，本身同時具有新式思想的理想性格，所以他必然是屬於既保守（外在）又進取（內心）的政治傾向，也就是傾向於維新變法與君主立憲，尤其他在宣統元年（1909）10

²⁴ 冀建中〈毛將焉附？——論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湯一介編《論傳統與反傳統——五四70周年紀念文選》，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5，頁245-246。

²⁵ 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第四章〈政教兼預，傾向革命——順應時代潮流的民主革命派朋友〉，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9，頁194-259。

月擔任廣東諮議局副議長一職色彩尤濃，因為諮議局的本質就是立憲派人士集結起來制衡朝廷立憲時程和革命派的組織，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說：

清廷以地方自治為預備立憲的起點，因有諮議局之創設。立憲派人通過選舉，一變而為民意代表，自此結為一體。議員固不盡屬於立憲派，立憲派人亦不盡當選為議員，而議員大都以張立憲為信仰，似無可疑。立憲派人在議會中者，實居於領導地位。各省諮議局議長幾俱為立憲派的領導人，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在地方上的態度更是舉足輕重。²⁶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分析諮議局議員的背景，得到以下結論：一、諮議局議員為具有傳統功名之士紳。二、若干具有功名者，同時亦曾接受新式教育。三、擁有產業者不在少數。四、高層士紳中多曾任中央或地方政府官職。張朋園更進一步探討其心理狀態：

立憲派是重現實的。他們的功名由統治者賞賜而得，…報效的觀念，牢不可破。…功名素為世人所重，在社會中仍可居於優越地位。萬一現狀改變，…社會地位亦將隨之不存。因此，士紳是必然擁護現政權的。對於有限度而不損及其既得利益的改革，他們可能表示贊同，但於激劇的變革，勢必反對。²⁷

張朋園〈立憲派的「階級」背景〉說到立憲派與革命派合作的關係：

²⁶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二章〈諮議局的建立與立憲派的結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2，再版，頁36。

²⁷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二章〈諮議局的建立與立憲派的結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2，再版，頁34。

新式教育使他們（立憲派）趨向進取。新式教育使他們認識了國家內憂外患的嚴重性。身為社會的領導階層，有心起而改革。改革是在現狀下為之，是有限度的改革，以不動搖社會的穩定性為原則。…立憲派與革命派妥協，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如果秩序不保，他們的功名、財富、社會地位隨之不保，這是他們最感恐懼的。各省諮議局人士致力於阻止革命形勢的擴大，穩住了舊有的秩序，他們的既得利益絲毫不受損傷。同意有限度的改革，還可以提升紳士階級的社會地位，得到更大的利益。²⁸

立憲派和革命派的終極關懷，都是實施民主憲政救中國，大家都看到了中國的落後腐敗，但兩派最大區別在於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立憲派要和平解決，為了繼續享有既得利益，革命派要武力解決，為了開創新的利益，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基本上都屬於和平解決的方式，因此斷定理論上丘逢甲的政治立場應該是立憲派，屬於改良主義的，但由於心目中的聖主光緒皇帝駕崩，以及好友劉士驥被立憲派刺殺的不幸事件，不排除其主觀情感上與道義責任上存在著對革命派的同情，他便由進取型降溫為保守型的立憲派，又因為道義與情感上較同情革命派，所以很容易與革命派中的溫和型混淆，並進行合流與妥協，加上丘逢甲有部分門生後來成為知名的革命志士，例如鄒魯、古應芬…等人，他基於師生情份，出面搭救學生，這也不盡然就說明丘逢甲一定就是反立憲保皇，或主張革命共和。因此從丘逢甲兼有官方與鄉紳身分，來看待他的政治立場，這種說法應該也滿合理的。

四、文學取向

²⁸ 張朋園〈立憲派的「階級」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6，頁228。

從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中支持尊王保皇的詩作，可以明顯看出丘逢甲的政治寄託，例如〈雜詩〉（頁 183）、〈苦雨行〉（頁 187）、〈日蝕詩〉（頁 244）、〈次韻答陶生〉（頁 278）、〈東山酒樓放歌〉（頁 386）、〈題菽園看雲圖〉（頁 410）、〈元旦試筆〉（頁 433）、〈哭李芷汀〉（頁 443）、〈北望〉（頁 499）、〈爲潮人士衍說孔教于鮑浦，伯瑤見訪有詩，次韻答之〉（頁 514）、〈題滄海遺民臺陽詩話〉（頁 546）、〈放歌次實甫將別嶺南韻〉（頁 578）、〈七疊韻答來詩意〉（頁 582）、〈前詩多見和者，所懷未盡，復次前韻〉（頁 676）…等詩作，都透露了丘逢甲對帝制的維護，至少可見他不攻擊帝制，這些詩作從《嶺雲海日樓詩鈔》卷 2 到卷 12，幾乎每一卷都有，也就是說丘逢甲從 1896 年至少到 1909 年期間，都是支持尊王保皇的。其中〈戊申廣州五月五日作〉（頁 589）作於 1908 年，也就是光緒末年（34 年），內容還在責怪革命黨引發的內亂，造成社會巨大的動盪不安。從以上證據顯示，丘逢甲一直到光緒皇帝駕崩前仍然是擁護帝制，是尊王保皇的立憲維新派支持者，至少等到心目中的聖主光緒皇帝駕崩後，他才不得已轉而同情革命派，關於此點，徐肇誠《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研究》也有著墨，其結論認爲丘逢甲本意以和平方式進行改革，最後發現情勢不對才由維新立場轉向革命立場的²⁹。但不管如何，丘逢甲的政治立場主要取決於他的社會位階，即使潮流轉向革命，他的處世之道基本上沒有產生革命性的變化。

詩界革命是維新運動衍生出來的文學活動，理論紮實，目標明確，有專屬的發揮園地。雖號稱「革命」，實則「改良」、「改革」，「革命」是內容題材上相對於「同光詩」或者傳統詩而言，梁啓超《飲冰室詩話》第 63 則指出：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

²⁹ 徐肇誠《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研究》第二章第二節之二「從維新至革命的心路歷程」，碩士論文，成功大學歷史所，1993.6，頁 61-69。

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³⁰

可見，詩界革命無意挑戰傳統詩的形式，只想挑戰傳統詩的內容和寫法。詩界革命到底仍然沒有棄守傳統詩「形式」的底限，儘管其內容的承載物可以各自表述，不受限制。此種既保守又開放的新興文學流派，和丘逢甲性格中既保守又開放的複雜成份，幾乎雷同，註定丘逢甲在文學流派的抉擇上，絕不可能走向仿古的傳統詩派，所以同光詩派、王闈運詩派、張之洞詩派不會成為丘逢甲考慮的目標。而在晚清傳統詩壇的文學流派中，唯一比較能滿足他滿腔熱血的書寫，又能提供他「詩史作雄談」的發揮園地，就是改良方式的詩界革命新派詩。儘管丘逢甲也有可能傾向革命派文學，即 1909 年柳亞子等人於上海成立的南社，對丘逢甲而言，一來不太具有地利之便，二來南社的詩學主張在成立之初，仍有學唐和學宋的論戰，至少在丘逢甲有生之年，南社詩學的方針並未趨於定見，而且可專供南社文藝發表的園地，在丘逢甲生前也尚未成熟（《南社叢刻》至 1910 年才創刊），對內渡後的丘逢甲而言，詩名的經營與教育事業的經營是並重的，況且他在民國元年（1912）2 月即辭世，也沒有機會與南社建立深厚的關係，或者另外開闢新的文學園地，所以他必然走向詩界革命的文學舞台，大展身手一番。

第三節 丘逢甲與黃遵憲的關係

從丘逢甲早期詩作的寫作傾向，與身分階級的意識形態等主觀條件方面，論

³⁰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第 9 冊第 18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5327。

證了丘逢甲必然走向詩界革命的合理性，而在地緣關係、交遊網絡等客觀條件方面仍深深地影響著一位文人的文學活動，有進一步論述的必要，才能完整呈現出丘逢甲與詩界革命淵源的全貌。而丘逢甲的眾多友人中，明顯屬於詩界革命人士且相識較早的是詩界革命的指標人物黃遵憲，其所居的嘉應州和丘逢甲的鎮平老家、歸籍潮州，皆有著良好的地緣關係，同屬於嶺東文化的一環，親近度較高，且兩人唱和詩作數量最豐，交情無庸置疑，黃遵憲影響丘逢甲的文學傾向自然不在話下。

一、黃遵憲生平經歷與文學主張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別署人境廬主人、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館主、布袋和尚、公之它…等，廣東嘉應人(今梅州市)。出生於一個以典當為業的富裕家庭，是個精明幹練的人，文學上沒有特別的師承，但講求特立務實，自小受到曾祖母喜愛客家山歌的影響，也重視客家民歌與題材的創作。家道歷經咸豐9年(1859)石達開部眾的寇掠，以及同治4年(1865)汪海洋的攻佔，從富裕變成貧薄，加上同治6年(1867)後赴廣州鄉試屢次落榜，身心受創極大，對現實社會產生高度不滿。光緒2年(1876)終成順天府試舉人，並捐納獲得五品官僚(知府)。光緒3年(1877)10月至光緒8年(1882)春天約4年多的時間，與何如璋出使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使館參贊。光緒8年(1882)春至光緒11年(1885)10月約4年期間，擔任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光緒11年(1885)年底至光緒14年(1888)待在嘉應故鄉撰寫《日本國志》，光緒16年(1890)正月至光緒17年(1891)7月約1年半期間，與薛福成前往英國倫敦，擔任中國駐英二等參贊，期間到過法國、地中海、蘇黎士運河等地。光緒17年(1891)10月至光緒20年(1894)12月約3年間，擔任中國駐新加坡總

領事。光緒 20 年(1894)清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回國主持洋務。光緒 22 年(1896)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並參加康有為「強學會」，同年底出使德國一事受阻，打擊很大。光緒 24 年(1898)與湖南巡撫陳寶箴共同推行新政，宣傳維新思想，同年 8 月發生戊戌政變，黃遵憲雖逃過一死，但遭到放歸，便回籍廣東嘉應人境廬，常與丘逢甲酬唱往來，互相砥礪與安慰，並與在日本的梁啟超書信往返，關懷國事時局，討論詩界革命，還在家鄉創辦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會長，光緒 31 年(1905)辭世。著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後人蒐集編輯的有《人境廬集外詩輯》、《人境廬雜文鈔》、《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³¹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以黃遵憲詩為詩界革命指標，並根據黃遵憲詩與詩論做為詩界革命文學批評的標準。特別推崇黃遵憲〈今別離〉、〈錫蘭島臥佛〉、〈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等詩，讚其開闢新詩境；〈罷美國留學生感賦〉、〈台灣行〉、〈朝鮮歎〉…等詩，讚其為詩史，寫近代中國苦難歷史的詩篇；〈香港潘蘭史題其獨立國〉、〈出軍歌〉、〈幼稚園歌〉…等詩，讚其鼓舞民氣、激勵愛國、尚武之作。黃遵憲的文學理論則有「我手寫我口」³²（作詩不可襲用古人的陳腔濫調，而應以自己的詩語寫自己的心情）、「不失為我之詩」（凡突破傳統的均可稱之為「新派詩」）、「為鼓吹文明而作詩」（有意識要利用詩歌，把社會諸多問題流播給廣大群眾）。黃遵憲的詩表現在推動維新的思想上，最具有特色，例如文明之鼓吹、殉身之謳歌、腐儒朽吏之嘲弄…等具有特定議題的詩作。³³

³¹ 以上見魏仲佑《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第三章〈黃遵憲之心路歷程〉，台北，國立編譯館，1994.12，頁 85-160。

³²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 1 即同治 3-12 年(1864-1873)期間，所作〈雜感〉五言古詩 5 首之 2 說到：「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詳見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冊，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3.4，頁 42-43。

³³ 以上見魏仲佑《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第四章〈黃遵憲詩之藝術〉，台北，國立編譯館，

二、丘逢甲與黃遵憲交往經過

丘逢甲與黃遵憲相識於光緒 15 年（1889），丘逢甲在北京考試時，黃遵憲剛好在北京待職，丘逢甲是新科進士，而黃遵憲則是有名的外交官，由於兩人祖籍同為嘉應州人，話題投機。隔年光緒 16 年（1890）丘逢甲成了黃遵憲〈歲暮懷人詩〉中的一位難忘的朋友，黃遵憲肯定丘逢甲對清代台灣教育事業的無私奉獻，將他比之為「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光緒 24 年（1898）丘逢甲歸籍潮州後的第二年，遇到黃遵憲因戊戌政變被放歸回家，潮州與嘉應州同屬嶺東文化圈，由於嶺東是華僑的故鄉，出入份子複雜且資訊流通快速，對時代的脈動能有比較精準的掌握，對西方文明的接受態度也比較開放，詩人很容易對時局產生憂患感。且當時黃遵憲的名氣很大，不管是外交實務方面的成就，還是國內推行新政的成效，甚至是「新派詩」的另闢蹊徑，以及《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的用力頗深，都是當時舉足輕重的人物（參見上文引述），丘逢甲雖然沒有正式踏入官場，但因為學歷很高，且頂著「在籍京官」的榮譽頭銜，加上台灣民主國一事也聲名大噪，兩人的條件和遭遇相當，剛好都遇到人生的低潮期，加上因為地緣關係，還有丘逢甲主動造訪，並為人境廬題聯，於是開始了互動頻繁的唱和交往。兩人往來的詩文內容，按時間先後排列，製成【附錄一】，而往來詩文目錄如下表：

【表一】丘逢甲與黃遵憲詩文往來目錄

時間	作者	題目	體裁、數量	出處
1890	黃遵憲	〈歲暮懷人詩〉	七絕 1 首	《人境廬詩草》

1994.12，頁 161-250。

				³⁴ 卷 6 頁 550
1898	丘逢甲	〈題黃遵憲人境廬無壁樓聯〉	對聯	《丘逢甲集》頁 693
1898	黃遵憲	〈人境廬之鄰有屋數間，余購取其地，葺而新之，有樓巋然獨立無壁，南武山人爲書一聯曰，陸沉欲借舟權住，天問翻無壁受呵，因足成之〉	七律 1 首	《人境廬詩草》 卷 9 頁 794
1898	黃遵憲	〈台灣行〉原稿本無此詩，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極可能在與丘逢甲見面後所作。	七言古體 66 句	《人境廬詩草》 卷 8 頁 687
1898	丘逢甲	〈感事〉20 首(又名〈政變詩〉)應是拜訪黃遵憲後深刻了解維新運動所作。	五律 20 首	《丘逢甲集》卷 4 頁 303
1899	丘逢甲	〈和平里行〉	七言古體 84 句並序	《丘逢甲集》卷 5 頁 322
1899	丘逢甲	〈寄懷黃公度(遵憲)〉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6 頁 416
1899	丘逢甲	〈致黃公度信〉	書信	《丘逢甲集》頁 797
1900	丘逢甲	〈古大夫宅下馬石歌〉	雜言七言 古體 27 句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0

³⁴ 本表出處欄所使用的《人境廬詩草》版本爲：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上下 2 冊，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1983.4。

			並序	
1900	黃遵憲	〈南漢修慧寺千佛塔歌〉	七言古體 90句並序	《人境廬詩草》 卷10頁899
1900	丘逢甲	〈南漢敬州修慧寺千佛鐵塔 歌〉	七言古體 76句並序	《丘逢甲集》卷 7頁481
1900	黃遵憲	〈寄懷丘仲闕逢甲〉	七律1首	《人境廬詩草》 卷10頁883
1900	黃遵憲	〈感事又寄懷丘仲闕〉	七律2首	《人境廬詩草》 卷10頁884
1900	丘逢甲	〈久旱得雨初霽，飲人境廬， 時間和局將定〉	七律2首	《丘逢甲集》卷 7頁484
1900	黃遵憲	〈久旱雨霽丘仲闕過訪，飲人 境廬，仲闕有詩，兼慨近事依 韻和之〉	七律2首	《人境廬詩草》 卷10頁950
1900	丘逢甲	〈用前韻賦答人境廬主見和之 作〉	七律2首	《丘逢甲集》卷 7頁485
1900	黃遵憲	〈再用前韻酬仲闕〉	七律2首	《人境廬詩草》 卷10頁952
1900	丘逢甲	〈三用韻奉答〉	七律2首	《丘逢甲集》卷 7頁485
1900	黃遵憲	〈三用前韻〉	七律2首	《人境廬詩草》 卷10頁955
1900	丘逢甲	〈四用韻奉答〉	七律2首	《丘逢甲集》卷 7頁486

1900	黃遵憲	〈四用前韻〉	七律 2 首	《人境廬詩草》 卷 10 頁 958
1900	丘逢甲	〈雨中游祥雲庵五用前韻〉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6
1900	黃遵憲	〈五用前韻〉	七律 2 首	《人境廬詩草》 卷 10 頁 961
1900	丘逢甲	〈六用前韻奉答〉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7
1900	黃遵憲	〈六用前韻〉	七律 2 首	《人境廬詩草》 卷 10 頁 964
1900	丘逢甲	〈遊西巖靈境院七用前韻〉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7
1900	黃遵憲	〈七用前韻〉	七律 2 首	《人境廬詩草》 卷 10 頁 967
1900	丘逢甲	〈聞歌有憶，八用前韻〉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8
1900	黃遵憲	〈八用前韻〉	七律 2 首	《人境廬詩草》 卷 10 頁 969
1900	丘逢甲	〈九用前韻〉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8
1900	丘逢甲	〈十用前韻〉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9
1900	丘逢甲	〈十一用前韻〉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89

1900	黃遵憲	〈和平里行和丘仲闕〉	雜言七言 古體 50 句 並序	《人境廬詩草》 卷 10 頁 1022
1900	丘逢甲	〈寄懷公度(時十二月立春前三日)〉	七律 2 首	《丘逢甲集》卷 7 頁 495
1900	丘逢甲	〈黃公度人境廬詩草跋〉	跋文	《丘逢甲集》頁 815、《人境廬詩 草》跋頁 1088
1905	丘逢甲	〈挽黃遵憲聯〉	對聯	《丘逢甲集》頁 696

從【表一】丘逢甲與黃遵憲詩文往來目錄中發現，在 1900 年出現一波很明顯的唱和詩歌，一開始應該是黃遵憲〈久旱雨霽丘仲闕過訪，飲人境廬，仲闕有詩，兼慨近事依韻和之〉先主動和丘逢甲原詩〈久旱得雨初霽，飲人境廬，時聞和局將定〉，接著便是一來一往的唱和，多達七疊，最後黃遵憲先收筆於〈八用前韻〉，但丘逢甲仍繼續和作，有〈九用前韻〉、〈十用前韻〉、〈十一用前韻〉三疊共 6 首，與黃遵憲詩歌唱和似乎意猶未盡。另外，1900 年黃遵憲主動和丘逢甲 1899 年的〈和平里行〉，同年丘逢甲〈南漢敬州修慧寺千佛鐵塔歌〉序文：「京卿（黃遵憲）已屬柳介（溫仲和）載入今州志（《嘉應州志》），復作歌屬予和焉。弔古慨今；遂有斯作。」（頁 481）可知，黃遵憲主動邀請丘逢甲和詩，丘逢甲也非常樂意為之。總之，黃遵憲應該很欣賞丘逢甲，不然不會主動和詩，丘逢甲也應該非常欣賞黃遵憲，不然不會主動造訪，並唱和到不能收筆的地步。由於，黃遵憲的新派詩早在梁啟超未正式提倡詩界革命以前，即有先行者的姿態，且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又多以黃遵憲的詩做為評價標準和範作，黃遵憲於詩界革命中

已是典範的地位，丘逢甲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與黃遵憲唱和，便意味著丘逢甲與黃遵憲的交往並非尋常。

以下從兩人唱和往來的詩作內容，進一步分析兩人共同關心的話題，筆者將【表一】目錄所列詩文的內容製成【附錄一】丘逢甲、黃遵憲詩文往來內容彙錄。

三、丘逢甲詩作寄投《清議報》與黃遵憲的關係

光緒 25 年（1899）3 月 11 日，丘逢甲的詩首度見報刊在《清議報》第 12 冊，名為〈題酸道人風月琴尊圖〉的七言長篇古體詩，這首詩在《嶺雲海日樓詩鈔》中收錄在光緒 24 年（1898），名為〈題風月琴尊圖為菽園作〉（頁 302），詩作刊出的前一年，丘逢甲才拜訪過黃遵憲，後作〈感事〉五律 20 首，極力讚揚維新人士，光緒 25 年（1899）康有為想要拉攏丘逢甲加入庚子勤王的活動，寫信給丘逢甲說：

竊不自量，以為吾嶺海磅礴，有吾兩人，如孟德（曹操）言，所謂使君與操也。…比者台澎舊侶，潮惠新知，以公號召，必當共濟。（康有為〈與丘逢甲書〉，頁 956-957）

這時，丘逢甲也積極參加自立軍「勤王」的籌備活動，雖然他後來還是退出該活動，但他如此快速與維新保皇派接軌，並進入他們的決策核心，想必有人為之先引，而此一先引者，想必是黃遵憲。

光緒 26 年（1900）1 月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的文學，也是文化的宣示。

新派詩的活動正式展開，同年丘逢甲二度造訪黃遵憲人境廬，讀完整本《人境廬詩草》，並為之寫跋，丘、黃二人唱和詩作達到高峰，至此約有 70 首詩的唱和，唱和內容多半針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事件中，朝廷的迂腐至極，人民的落伍迷信，帝國主義的蠻橫殘暴，抒發憤憤不平的感受，並在艱難的時刻互相安慰，以七言律詩的形式進行著。

總之，丘逢甲詩作被大量刊載於《清議報》的時間為光緒 25、26 兩年，共有 17 題 45 首詩作³⁵，而丘逢甲與黃遵憲唱和往來最為頻繁的時間為光緒 24、25、26 三年，共有 31 題 72 首詩作（參見上表），兩者時間重疊範圍廣，合理推論黃遵憲是引導與啓蒙丘逢甲走上詩界革命的關鍵人物，所以丘逢甲人生際遇上得以與黃遵憲近距離的接觸和交往，實際上幫助了他邁向詩界革命之途的進程，並有效縮短他在詩界革命中熬出頭的時程。保守一點地說，丘逢甲是在與黃遵憲接觸過後，詩作才開始大量見報，才有〈論詩次鐵廬韻〉之「重開詩史作雄談」的文學豪語，也才能搭上梁啟超高喊「詩界革命」的列車。可見，黃遵憲應該是真正讓丘逢甲在文學上找到著力點的關鍵人物。

四、丘逢甲與黃遵憲爭雄公案

丘逢甲選擇與黃遵憲主動親近的原因，自然是肯定黃遵憲嶺東詩壇盟主的地位，徵引兩文為證：

³⁵ 光緒 25 年（1899）還刊出了〈雜詩〉1 首（原作有 3 首）、〈苦雨行〉、〈題星洲寓公看雲圖〉、〈題無懼居士獨立圖〉、〈論詩次鐵廬韻〉10 首、〈殺鴉行〉、〈聞海客談澎湖事〉2 首，光緒 26 年（1900）刊出的有〈東山感秋詩六絕句次汀州康步匡中翰詠癸巳題壁八月六日作〉6 首、〈和獨立山人論詩韻二律〉2 首、〈再疊龕字韻五首奉寄星洲香海〉5 首（原〈寄蘭史、曉滄、菽園用曉滄韻〉）、〈與平山近藤二君及同志諸子飲香江酒樓兼寄大隈伯相犬養先生（春官日本東京）〉、〈歐冶子歌贈伊广主人〉等詩。詳情見第三章第二節。

1、光緒 25 年（1899）丘逢甲〈與蘭史〉：「嶺東詩人，鄙見當以黃公度首屈，胡曉岑名曦次之。公度海內知者尚多，若曉岑山村寂寞，過問者稀。」（頁 799）

2、光緒 26 年（1900）丘逢甲〈黃公度入境廬詩草跋〉：「茫茫詩海，手闢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變舊詩國為新詩國，慘淡經營，不酬其志不已，是為詩人中嘉富洱；合眾舊詩國為一大新詩國，縱橫捭闔，卒告成功，是為詩人中俾思麥。為哥倫布，偉矣！足以豪矣！…海內之能於詩中開新世界者，公外，僕指可盡。…開先之功，已日星河嶽於此世界矣。」（頁 816）

丘逢甲深知黃遵憲的文學實力，他又想趕快打進詩界革命的圈子，以找到文學事業的寄託，於是追隨黃遵憲的文學步伐，部分詩作上可以看出丘逢甲模仿黃遵憲的痕跡，張永芳〈丘逢甲與詩界革命〉說：

丘逢甲讀過《入境廬詩草》後，極力摹擬黃詩風格，也寫下多首描寫海外風物的「新派詩」。如〈七洲洋看月放歌〉…其體制、其構思，顯然是摹擬黃遵憲的〈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丘逢甲另一首模擬之作〈海中觀日出歌由汕抵香港作〉，則詠寫了黃遵憲未曾寫到的近代地理知識。³⁶

黃遵憲的〈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收錄於《入境廬詩草》卷 5，即光緒 11-15 年間的作品，而丘逢甲〈七洲洋看月放歌〉收錄於《嶺雲海日樓詩鈔》

³⁶ 張永芳〈丘逢甲與詩界革命〉，《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0 年第 9 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頁 277。

卷 7，即光緒 26 年的作品，這兩首詩的內容題材極相似，黃遵憲早於丘逢甲 10 年以上寫成。另外，黃遵憲有〈五禽言〉，丘逢甲有〈禽言〉，這兩首詩的內容題材也極相似，黃詩寫於光緒 26 年，丘詩寫於光緒 34 年，黃詩早於丘詩 8 年寫成，也是屬於丘逢甲追步黃遵憲的同題詩作。

然而，丘逢甲內渡前在清代台灣是第一流的詩人，內渡後起初在廣東詩壇上並沒有什麼名氣，而廣東詩壇的盟主一直由黃遵憲穩坐，丘逢甲似乎企圖藉著唱和切磋的機會，引起黃遵憲的注意，以提高自己在廣東詩壇的能見度。證據如下：

1、光緒 25 年（1899）丘逢甲〈復菽園〉云：公度謂弟（丘逢甲）詩在兩當軒（黃仲則）、師水齋（可能是崔預）之間，不敢謂然。又謂已造到大家分位，但喜用小說家言，則不免墜落名家。弟謂吾詩不詣大家、名家，但自成吾家耳。（頁 793）

2、光緒 26 年（1900）丘逢甲〈黃公度人境廬詩草跋〉云：地球不壞，黃種不滅，詩教永存，有倡廟祀詩經者，太牢之享，必有一席。信作者兼自信也。…海內之能於詩中開新世界者，公外，儻指可盡。忽有自海外來與公共此土者，相去只三十西里耳！後賢推論，且將以此土為東方詩國之薩摩、長門，豈非快事？（頁 816）

3、洪棄生《寄鶴齋詩話》云：廣東嘉應州黃公度（遵憲），前出使日本為參贊，後為湖南道。近年間住在家，以能詩名；獨據粵之壇坫，時鮮出其上者。至邱仙根內渡，始欲「拔趙幟立漢幟」，遂生齟齬。文人習氣，迄今猶然；甚無謂也。³⁷

丘逢甲、黃遵憲到底有沒有惡意較勁，單靠上述資料很難下定論，但看起來

³⁷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304 種《寄鶴齋選集》，1972，頁 217。

似乎丘逢甲比較有患得患失的心態，這件公案在當時引起相當的注意，1900年冬天，人在南洋的康有為，為調和在廣東的丘逢甲、黃遵憲寫詩互相爭雄的問題，寫了3首七言絕句〈聞邱仙根工部歸里，與黃公度京卿各爭詩雄。文人結習，別開蠻觸，以詩問訊，且調之〉，此詩原題為〈聞邱仙根工部歸里，與黃公度京卿各爭詩雄致不睦。文人結習，別開蠻觸。國危矣，尙如此，二君皆吾舊交，以詩托邱舍人致意問訊，且調之〉，詩的內容為：

五嶺崢嶸轟兩峰，詩壇滕薛日爭雄。如斯蠻觸原風雅，只恐山河在割中。

亡國原為好詩料，保身最好托詞章。只愁種滅文同滅，佳集雖傳亦不長。

回首故鄉歌大風，飛揚猛士為誰雄。陸沉應作反招隱，可惜閭浮國土空。

38

康有為委婉地規勸丘逢甲、黃遵憲，以國家大局為重，切勿因為逞個人一己之私利與虛名，而忘記知識分子救國救民的重責大任。這件事也可參考丘煒菱〈揮塵拾遺〉卷四云：

黃君落落大方，芒寒色正；邱君嘎嘎獨造，骨老氣蒼。善月旦者，仍未敢輕為軒輊。乃仲闕豪氣未除，高臥百尺樓上，目公度為第二流。公度不服，互有辯論，大生嫌隙。康更生水部時居海外，聞而嗤之，寄以詩云。³⁹

丘煒菱說康有為所寄的詩即為〈聞邱仙根工部歸里，與黃公度京卿各爭詩雄。文人結習，別開蠻觸，以詩問訊，且調之〉七絕3首。但若根據康有為《萬木草堂

³⁸ 康有為《大庇閣詩集》，《康南海先生詩集》第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頁45-46。

³⁹ 由於《丘逢甲集》所附〈揮塵拾遺〉並非完整版，而台灣也不容易找到完整版，只好轉引自丘鑄昌〈試論丘逢甲與康、梁、黃之關係〉，《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頁121。

詩集》的手稿本或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會發現康有為當初在此詩下有一眉批云：「仙根其人，心胸甚窄，睚眦必報，現其人尙生，此詩似不必使其見。」可知丘逢甲在與黃遵憲爭雄的傳聞中，丘逢甲給予人家的觀感是比較負面的。

丘逢甲與黃遵憲爭雄公案到底真相如何，目前所知有限。但可確定的是後來兩人的互動仍然存在，沒有因此交惡。光緒28年（1902）黃遵憲〈致梁啓超書〉云：

徵詩必有佳作，吾代徵之倉海君，即忻然諾，我聞已有〈新樂府〉二三十寄去。事徵之十年以來，體略仿十七字詩云，收到否？此公又以〈汨羅沉〉四篇附寄，乞察存。…

頃已將拓本（菊花硯）示滄海君，渠甚高興。（此君詩真天下健者，渠自負曰：「二十世紀中，必有刻黃、邱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後，與公代興。」論其才調，可達此境，應不誣也。）吾集中固有與公交涉之詩，丙申四月有贈詩六首，（似曾錄以示公，或是時公意不屬，忘之矣。）⁴⁰

以上文字可以明顯看出，黃遵憲對丘逢甲的提攜有加，且黃遵憲刻意要拉近丘逢甲與梁啓超的距離，因為丘逢甲與梁啓超一直沒有直接的互動關係，且《清議報》在日本創刊，而黃遵憲又具有日本經驗，與梁啓超私交甚篤，因此推論，丘逢甲發表於《清議報》的詩作應該是在黃遵憲的建議或幫忙之下，才成行的，也或許在日本的梁啓超是看在黃遵憲的面子上，才刊出丘逢甲的詩作也不一定。還有一點很難能可貴，黃遵憲面對丘逢甲的誇口自負和善意的較勁，似乎不以為意，反

⁴⁰ 黃遵憲著，吳振清、徐勇、王家祥編校《黃遵憲集》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0，頁500、502。

而以平常心和欣賞、包容、諒解的態度，肯定丘逢甲的詩藝，這更化解了丘、黃之間可能產生的尷尬，也打破中國自古「文人相輕」的慣例。

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黃遵憲可說是帶領著丘逢甲進到詩界革命中的關鍵人物，從啓蒙、切磋、推薦到互相較勁，黃遵憲算得上是丘逢甲在內渡後詩國世界裡的貴人與恩人。